

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

〔英〕伊丽莎白·拉蒙德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

〔英〕伊丽莎白·拉蒙德 编

马清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9年·北京

Edited from the MSS
by Elizabeth Lamond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54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4 年版译出

LÜN YĪNGGUÓ BĒNTŭ DE GŌNGGÒNG FÚLĪ

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

〔英〕伊丽莎白·拉蒙德 编

马清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076-9/F·8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2 千

印数 1,100 册

印张 5

定价: 1.90 元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描写十六世纪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后半叶英国社会状况的一本重要著作。1581年最初用《略论英国政策》书名出版，作者署名为S. W.。中译本所据版本系1893年由伊丽莎白·拉蒙德根据原著整理编校而成。

全书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参加对话的角色有手工业者、庄稼人、博士和爵士五位不同等级不同身分的人。博士是对话人中的中心人物，他的话代表了作者的意见，贯串着全书的基本思想。

全书的结构分三层，即三次对话。第一次对话，表述了各类人物对当时一些现象的不满，以及他们如何就遭受不幸的原因相互埋怨。这里反映出英国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第二次对话既谈存在的问题，又讨论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第三次对话，提出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

按照博士的说法，当时英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这种普遍的、全面的物价上涨现象，是所有的人对之颇有怨言的最主要的不幸事件。其次是我国财富的耗竭。第三是圈地和把可耕地变为牧场的行径。第四是城镇、教区和乡村的凋敝。最后，人们对宗教的意见分歧和差异”（本书第104页）。当时英国的中部，把公地圈为牧场已进行到很大的规模，大量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因而农业日益凋敝。贵金属从新发现金银矿的国

家(特别是美国)涌入欧洲,以及欧洲各国对铸币实行剪币和掺假政策,又使商品普遍涨价,广大群众极为不满,不少地方出现骚动和叛乱。针对这种情况,作者通过博士之口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办法:改革货币制度,确定金、银、铜币的正确比价;振兴农业,提高农作物价格,允许农民自由出卖农产品,使种地比放牧有更多的收益;保护本国的加工工业,扩大就业,并提倡消费者消费本国产品,本国能制造的工业品决不进口。

这部著作在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作。作者的重商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1. 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的真正财富。他说:“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本书第119页)。他主张发展农业,因为他认为“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本书第71页)。他反对发行分量不足的铸币,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我们的硬币质量低劣,改变了模样,外国人就伪造了我们的硬币,设法把大批大批的伪币运到这里来脱手,既换取我们的金银,又换取我们的主要商品”(本书第87页)。他不是按生产,而是按照货币的流向来划分行业,也是从只有金银才是财富的观点出发的。

2. 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利润是在商品流通中由于贱买贵卖而产生的,国内贸易不会引起货币的外出与内流,对财富无所增减。他在谈到如何恢复英国的财富时说:“首先,我们可以禁止输入我以前讲到的从海外运来的那么许多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并规定只准出售我们自己的商品,不得销售舶来品;其次,我们不能不管未经加工的商品,因为如果把那些商品及时地就地加工后卖到国外去,它们就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无数的财富了”(本书第

96 页)。

3. 对外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 只有出超才能使金银进口, 杜绝本国财富外流。他说: “务必使我们向外国人购买的货物不超过我们销售给他们的货物, 要不然我们就会自趋贫穷, 让他们发财致富”(本书第 73 页)。

4. 提倡保护关税, 使用国产品, 发展本国加工工业。他提出, 即使有的商品本国生产的比进口的成本高, 也应该买本国的。“我们最好还是付出较高的代价向我们自己人购买那些货物, 而不要以低价向外国人购买; 因为不管多么少的收益流往国外, 对我们来说总是一项损失。可是, 不论多大的收益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 毕竟还是保留在国内”(本书第 75—76 页)。“我特别希望不要使用海外任何以我们的原料如羊毛、兽皮、锡等制造的、返销到这里来的商品”, 如果本国生产这些东西, 就不仅“可以安排 2 万人就业”, 而且“购买这些商品的货款则留在国内, 并不外流”(本书第 130 页)。

这本著作一直受到研究经济学说史的学者的重视, 但本书作者是谁, 曾引起人们的猜测和考证。本书在 1581 年初出版时作者署名为 W. S.。由于该书是用对话体裁写的, 文笔较雅, 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有人推测该书出自威廉·莎士比亚的手笔。但后来有人认为该书作者是威廉·斯塔福德。到十九世纪末, 伊丽莎白·拉蒙德在英国杂志《英国历史评论》1891 年 4 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对该书作者进行考证的文章, 认为该书作者是约翰·黑尔斯, 而威廉·斯塔福德只是出版者。据她说, 该书写成时间是在 1565 年, 而 W. 斯塔福德予以出版是在 1581 年, 只不过在付印前作了一些

修改和变动,改名为《略论英国政策》,并署了自己姓名的缩写。拉蒙德在 1893 年以编者拉蒙德的名义重新出版了该书,书名也改为原名《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即我们现在出版的这本书的书名)。现在拉蒙德的看法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有关著作,如 E. F. 赫克谢尔的《重商主义》和 E. 罗尔的《经济思想史》等都认为此书作者是约翰·黑尔斯。根据拉蒙德的考证分析和国内的一般看法,我们取作者为约翰·黑尔斯之说。

原书最后有编者所加“注释”多页,均系按正文逐页说明两种手稿在个别用词上的细小差别或某一个词在甲稿(或乙稿)略而不述的烦琐考证,我们考虑到两稿的这些细微歧异并不妨碍此书内容的完整,所以没有把“注释”译出。

戴 芳

1987 年 11 月

目 录

简短说明·····	1
导 言·····	3
序 言·····	25
第一次对话·····	28
第二次对话·····	50
第三次对话·····	104
译名对照表·····	147

简短说明

当拉蒙德小姐意识到她不可能希望在她逝世以前编完这本书时，我承担任务来监督书籍的排印过程。她努力工作到最后一息。1891年8月11日星期二晚上，她花了一小时或者多一点的时间对照剑桥大学收藏的兰巴德先生的原稿阅读校样。两天以后，她旅行到她在爱丁堡的家乡，在接下去的星期天上午在那里溘然长逝。

拉蒙德小姐的工作计划草案制订得很清楚，但我感到责任重大，要力图完成她那要求严格的习性和不倦的耐心使她特别适宜承担的一项任务的其余部分，却非同小可。

当我承接这项工作时，我发现还有不少事情需要完成，而其他一些预先约定要办理的事项又使这种推迟出版的情况成为不可避免。拉蒙德小姐曾经准备好了本书正文据以排印的兰巴德先生的原稿的抄件，以及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原稿的目录和旁注的抄件；她还根据兰巴德的原稿校阅了第一篇对话的校样。她在《英国历史评论》（1891年4月）上发表的文章连同她打算加以改写的一些暗示，提供了用以撰写导言的资料。有两三页的注释已经写成，但有大量的资料需要彻底重新整理。导言和注释并不完全代表她的成熟的见解；在不止一处，她希望能够再次仔细检查一下论点的依据，虽然她的主要结论已经得到公认。（科萨：《导言》，第三版，第

198 页。阿什利:《经济史》,第一卷,第 260 页。)

为了所获得的热情帮助,我除自己表示感谢以外,谨代表拉蒙德小姐致以谢忱:感谢兰巴德先生,因为他同意让我们长期连续使用那部成为本书基础的非常有趣的原稿;感谢牛津大学图书馆当局亲切地专门给拉蒙德小姐提供方便,让她核对他们所收藏的原稿;感谢三一学院研究员 J. D. 达夫先生就一些特殊问题给予的帮助;此外还要感谢圣约翰学院研究员福克斯韦尔教授、伦敦档案局的休伯特·霍尔先生、格顿学院的 E. A. 麦克阿瑟小姐、英王学院的 F. B. 斯马特先生、苏黎世的萨普斯沃思教授,以及剑桥大学图书馆的 A. 罗杰斯先生。

W. 坎宁安

1893 年 8 月 9 日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导 言

一、

现今发表的这篇“对话”在其较早的形式方面有过一段稀奇的经历。它最初印刷于 1581 年,当时的原作者据称是 W. S.; 但现在看来,不管这个人可能是谁,他同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毫不相干。他删去了一些段落,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就大部分来说,他满足于修改暴露内情的语句,没有花什么工夫把工作做得合乎现代的要求。可是,虽然关于 W. S. 的姓名和身分已经产生了许多争论,人们对他有权自称为作者这一点却似乎并无重大的疑义。一位有胆量的出版商在 1751 年大胆地把这篇“对话”说成是威(廉)·莎(士比亚)写的;虽然这种突兀的意见使它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接受,但人们认为可以相信这本小册子是描述莎士比亚青年时代的英国状况的作品。事实上,人们已经大体上承认它是描写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后半叶的英国社会状况的一本主要的权威著作,尽管它同哈里森笔下的内容有明显差别。然而,肯特郡的文物收藏家威廉·兰巴德在他那份“对话”上所写的按语却有效地排除了 W. S. 提出的自称为作者的理由,证明这本书早在它出版的那个日期以前就写成了。“请注意这本书是在 1581 年由一位 W. S. 用《略论英国政策》这一书名印刷出版的;另一方面,它早就出诸于圣托马斯·史密斯(象有人所说的)或约翰·黑尔斯先生(象其他人

认为的那样)的笔下,其年份在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六世当政的时代。我早就拥有的这份原稿,据我判断是在1565年写成的。”^①这个资料从一种新的角度显示出了与“对话”有关的一切问题。这个新版本目的在于按照已知的最早形式提供这篇论文,并显示出W. S. 在他于1581年付印前所作的修改和变动。我们不能再把作者是谁的问题看作单纯讨论W. S. 的身分的问题,而是必须借助于论文的最早形式所提供的内在的证据来重新加以考察。如果我们认为“对话”的主旨在于记录一次实际的谈话,并审查它所提供的可能发生这次谈话的日期和地点的明确迹象,那么,可以用来推测的范围就很狭窄了;当我们确定了关于时间和地点的范围时,我们就能够考查证据,以辨明参加那次辩论的人物的真实姓名,特别是辨明那位叙述整个问题的爵士究竟是谁。因此,书面报道“对话”的日期问题应当被认为与发生谈话的日期问题截然不同。这种种要点经过仔细的探讨,就会接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对话”所涉及的事项和当时环境的性质,即使人们认为作者选定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段而已。

二、“对话”的日期

在我们找到一条线索,了解到谈话的日期应如何确定以前,我

① 这个注释复制在插页图四上面。尼科尔斯在其关于兰巴德原稿的目录中(不列颠地志图书目录[肯特郡],第512页)提到它,但他把注释读作“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或约翰·耶茨”。只要比较仔细地审查一下字迹,就可看出这是一个错误;H的写法很特别,甚至兰巴德自己也不常用;但他偶尔采用这个形式,例如他在1585年7月29日一封信的最后一行所写的Hallyng一字中的H那样(不列颠博物馆科顿·朱利叶斯普通本第25页),在注明日期为1584年12月2日的一封信中也有这同一个字(不列颠博物馆兰斯多恩43,第44页,第21号)。

们大可不必深入地仔细阅读“对话”的内容。第一句谈到英王陛下有关圈地问题的委任。关于这项引起热烈争论的问题的重大委任,发生在早于1565年的1548年。在那一年的6月,任命了6位委员^①去调查英国中部一些郡的情况,因为那里把公地圈为牧场以饲养绵羊的做法已进行到极大的规模。这项任命的提出,是为了减轻民众已在康沃尔郡暴动中形成的不满情绪。然而,这一措施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因为委员们在某些郡的行动似乎已经给反抗提供了借口^②,在下一个夏季,人民“一部分为了圈地,一部分为了宗教,在英国多数的郡里爆发成为一场可怕的公开叛乱”^③。“对话”有几处提到社会骚动的情况,一位发言人说那些骚动是由于圈地,另一位认为它们起因于有关宗教问题的争端。如果说那次谈话确实发生过,那它一定发生在1548年发表任命圈地委员之后。

提到这个问题的其他几处地方使我们能够更确切地认定具体的日期。博士抱怨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国内制造的一切布匹“已按最后一次向国王提供特别津贴每英镑征收12便士的税则”课税。这项异乎寻常的实验曾于爱德华六世在位的第三年试行过。1549年通过了一项“在三年期间减少谷物、绵羊和衣服等商品向国王提供特别津贴的法案”^④。然而,在这项法案实施以后,政府又逐步加以取消。1549年11月16日,“德文郡的若

①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二卷,第149、268页。

③ 斯特赖普:《约翰·切克爵士》,第40页。

④ 第二和第三版,第六卷,第36章,第8、9节。《下议院议事录》,1548—1549年2月14日。

干服装商提出了恢复救济成衣业法案”的议案^①。同月18日,《下议院议事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下议院院长先生应会同下院的国王枢密顾问和下院的十二名其他议员成为恳求人,通过陛下的枢密院以了解陛下的旨意,如果根据他们微末的恳求,他们可以在下午四时讨论最后一次救济成衣业和饲养业的问题的话。”^②这项请求得到了允准^③,11月11日一项新的“豁免最后救济法案中规定的饲养业和成衣业部分负担的议案,以及另一项准予再实施一年的救济谷物种植业的议案”,在下院初次宣读。^④它很快就通过了几个阶段,于1550年1月17日在上议院第三次宣读。^⑤因此,1549年夏是对国王支付特别津贴的仅有的一个夏季,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这就是博士在对话中提到的那个夏季。

这篇论文还特别提到同一夏季的另一事件。在由商人之口发表的第一批谈话的一段中,他抱怨说,虽然引起开支浩繁的一些因素已被抑制,经济繁荣却并未增长。他所列举的开支增多的原因是“舞台表演、幕间穿插、五朔节游戏、通宵宴会、纵酒狂饮、狩猎赌博、摔跤比赛等等”。1549年8月6日发布了一项公告^⑥,“禁止赌博”。“国王陛下……命令其一切臣民……从目前8月9日起至下一次万圣节到来时为止,不得有任何人公开地或秘密地用英语表演任何种类的幕间话剧、对话或其他以戏剧等形式演出的题

① 《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一卷,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一卷,第12页,1549年11月20日。

④ 同上书,第一卷,第13页。

⑤ 《上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381页。

⑥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270页。

材。”^①关于摔跤,在《赖奥思利编年史》的1549年部分记载着这样的事项:“摘要:郡长们的一所法院规定,由于诺福克郡和我国其他地方发生骚动,今年应当制止和停止摔跤比赛。”^②翌年,准许举行摔跤比赛^③,1551年准许举行“摔跤和射击比赛”^④。

此外,论文中关于铸币状况的述评同1549年的事态十分吻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博士说明,当硬币的价格上升时,商人们立即搜罗旧币,把它运出国外。1549年4月11日发布了一项公告,指出有些人已经如何把金币、特别是旧币运到国外去,声明要禁止这种行为,否则定予严惩。^⑤同一份公告还宣布,“海外有关方面的一些人企图秘密地大量伪造头像银币、先令、格罗特以及国王陛下铸造的其他银币,把它们运进我国”,因此责成海关对那些伪币勤加搜查。^⑥从国外运入的伪币在论文中也被提到了。“我国的旧币安琪儿以前不过值20格罗特,现在却值30格罗特了,其他的一切旧币不是也按这样的比例涨价了吗?可是我想,纵然银币的价格涨得很多,从原来的20格罗特涨到30格罗特,银币还是不可多得”(本书第89页)。在爱德华统治时期之初,安琪儿值8先令,在上文引证的公告(1549年4月11日)中,它涨到9先令8便士^⑦;1551年,每个安琪儿值10先令。这最后一项乍看起来似

① 《公告汇编》,页码66。〔不列颠博物馆 C.12.b.17〕

② 《赖奥思利编年史》(卡姆登学会),第二卷,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42页。禁止幕间穿插演出的禁令要求普遍执行;但有关摔跤比赛的条文仅涉及伦敦,它似乎表明,禁令仅为一时的权宜之计。看来有必要获得当地的资料以证实这个结论。

④ 同上书,第54页。

⑤ 《公告汇编》,页码30b。

⑥ 同上,页码32b。

⑦ 同上,页码31。

乎就是作者所提到的“值 30 格罗特的安琪儿”，但我们必须记住，在价值为 10 先令的安琪儿发行以前，人们对格罗特估定的价值已有两次下降，合 9 先令 8 便士的安琪儿在通常交易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当作至少值 30 个劣质格罗特的货币使用。^① 1551 年 7 月，格罗特从 4 便士降到 3 便士，同年 8 月又从 3 便士降到两便士，在第二年的 10 月格罗特被回收，在那个月份铸造的新币（10 先令的安琪儿占其中一部分）中，没有发行格罗特，至少没有发行 4 便士、3 便士或两便士的格罗特，而当时格罗特这个名称指的是 12 便士一枚的货币。^② 按“30 格罗特”计值的安琪儿很可能是在 1549 年出现的。

这里指出的各点十分清楚和确切地证明，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作者当时是在描述他在 1549 年秋季所了解的英国的状况。

三、“对话”的地点

“对话”开头谈到 1548 年圈地委员会的那一段不仅指出谈话的日期，而且指出谈话的地点：它发生在委员们所到地区范围内的一个城市。这些圈地委员的巡视活动都有记载，所到地区包括牛津郡、伯克郡、沃里克郡、莱斯特郡、白金汉郡和北安普敦郡，而这些郡的仅有的几个城市是牛津、考文垂和彼得博罗。这三个城

① 请参照《减少国币发行量等等的政策》。“如果他想把金币贮存下来，那么，他本来一部分按 6 先令 8 便士计值了三十年的安琪儿即将值 10 先令或接近这个数额。”第 8 页。

② 请参照 1551 年 10 月爱德华日记中的记载。“委任铸造 5 先令、半个 5 先令、格罗特、6 便士、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的事项随即作出决定，并签署文件。”《遗稿》，第 346 页。

市中的一个似乎就是举行“对话”的场所；其中两个可以立即排除在外，不值得考虑。在都铎王朝时代，牛津和彼得博罗都不是重要的工业中心，而“对话”所在的城市却与它们不同；彼得博罗也没有衰落，因为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企图复兴凋敝城市的法令中并未提到彼得博罗；商人和制帽商关于所居城市昔富今贫的怨言似乎并非针对那两个城市而发（本书第 32、33 页）。就考文垂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那里已经建立起了若干生产毛织品的工业，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前该城是个繁荣和兴旺的城市。该城的修道院以及其他宗教机构的遭受破坏使其面目全非。达格代尔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久以后变得一蹶不振，因为在不幸的经济崩溃以前常常大批聚集到那里去的人不见了，成千上万的居民为了谋求较好的生活，不得不放弃那个城市。那时颇有名望的约翰·黑尔斯（他对历史的回忆现仍脍炙人口）曾向当时担任护国公的萨默塞特公爵指出，那时的居民不超过 3,000，而根据他的回忆，原来的居民却有 15,000 人之多。”^①

所提到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将同我们对考文垂了解的情况相符合。商人谈起的那所慈善收养院（本书第 33 页）很可能就是设在考文垂的福特慈善收养院，该院由于它那雕刻精美的木结构山墙而足以证明从前一位市长威廉·福特的乐善好施的可贵精神。他是经营主要商品的商人，设立那所慈善收养院的目的在于救济 5 个男人和 1 个妇女，他每星期给他们发一次生活费用。^② 该院建筑

① 《沃里克郡》，第一卷，第 146 页。如果所说的 1479 年瘟疫夺去了该城 3,000 人的生命或者该城及其管辖地区 4,550 人的生命，这一报道并非虚构，上述关于人口的估计似乎不算是言过其实。

② 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 184 页。